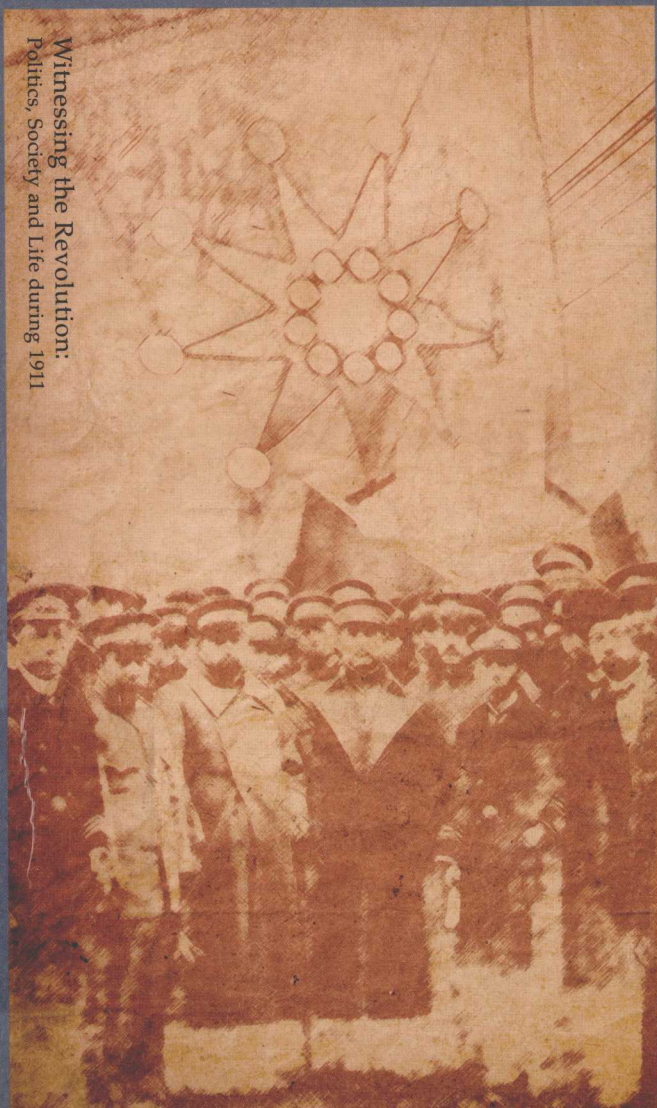


生逢革命

辛亥前后的
政治、社会与人生

孙明 著

Witnessing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Society and Life during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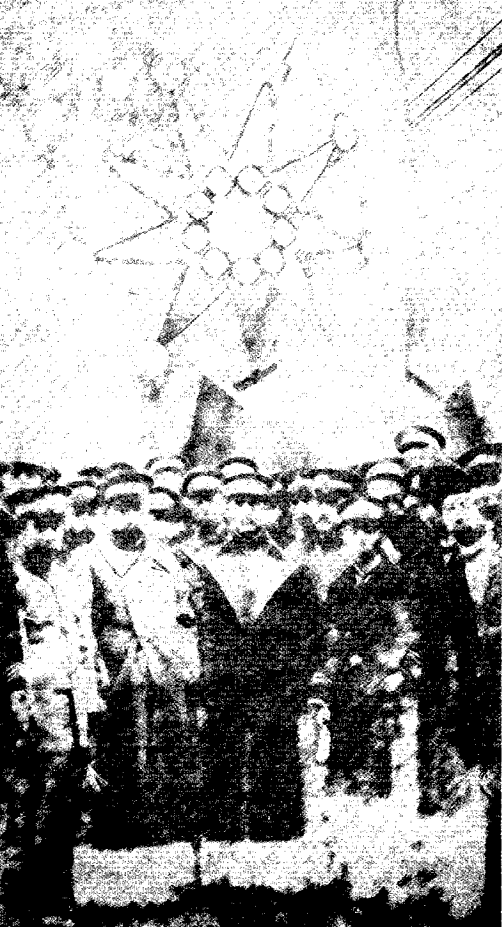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生逢革命

辛亥前后的

政治、社会与人生

Witnessing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Society and Life during 19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孙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301 - 21751 - 1

I. ①生… II. ①孙… III. ①政治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②辛亥革命 - 研究 IV. ①D691 ②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1232 号

书 名: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

著作责任者: 孙 明 著

责任编辑: 陈 健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1751 - 1/K · 09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5.5 印张 104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我在百年前四川的几个县遇到这几个人，
他们本来是矿工是绅商是学生是先生是不知名的小市民，
只因为生逢革命，
便成为头领成为烈士成为未亡人成为沉默献身的大多数，
我打定主意请他们回来成为革命史的主角，
以照亮时间深处的悲壮、沉痛、冷漠和生活。

——题记

前言

我必须承认，写这些故事时，是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牵引着落笔。写到《“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时，我明显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升腾，到《烈士的正名》已不可遏，《将革命写入“里史”》则完全是在其驱动之下的产物。

好像小说家有一种说法，小说不是按计划产生的，人物一旦出场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故事则推着笔往前走。

这情绪如此苍凉与悲壮，我被它困得抬不起头。身边事一度竟然不再清晰，我完全沉浸在那段历史里，在那种情绪的历史里。为了生活，我不能停止故事，只好停下笔。

刘香亭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宣统元年他在威远县新场掀起了民变，2003年我第一次将他写入硕士论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闽族冬至会上说：“你们穿靴子的坐得上霸位（首席），我穿草鞋的也坐得。”他声称看到“扫帚星”落在屋后山上就意味着自己要当几天乱世头头，但并不长久。还说“我的脑袋，许了坛神菩萨已很久了。”这是一位怎样出场的“大

元帅”呢？直到去了威远，走在百年后新场街面上，我才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写出与刘香亭不同的街面上的豪强，写出矿业社会、袍哥世界和“学界”与团保的新旧之争，写出刘氏家族的变迁，才能看清楚“死水微澜”的波心与涟漪。

刘香亭是一个普通人。我想起科大卫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近代中国的普通人”课程。科先生以“从改革到革命的阿 Q”起讲，2003 年我就对“川人无路哭先皇”深深好奇，那一群中国第一波“从改革到革命”的普通人啊，头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潮水一样涌向四川总督府，却被赵尔丰以枪弹应之。2003 年国庆假期，我住在川大家属区一栋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天刚亮出去时麻将已先声夺人，暮色里乘着酒兴归来麻将也正在兴头上。百年前，这样的小百姓，为什么敢顶着先皇牌位往衙门里冲？七八年间，这个问题一再涌上心头，从《会典》到报刊看了几遍也不得其解。直到 2010 年，看到周询的《芙蓉话旧录》，我才明白皇帝的礼仪是以一种何等轻松愉快的模样活在成都的市廛中，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成都人以“清君侧”一样的自信挺身而出。这才是普通人的“革命”。

从成都的枪声中，传出了“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恐慌。我很想写“剿川”的意识源头，它应与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的历史记忆相关。但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几位烈士的死难与正名更让我挂念。他们在革命在思想上比刘香亭更加清楚，但

是，在“哭先皇”发端的“革命”之后，他们的境遇怎么样？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或者稍为时尚一点说，辛亥革命没有伴随社会革命，烈士之死是集中说明。他们率哥老同志起于旧的社会，又被旧的社会吞噬。“川人无路哭先皇”带给我历史的悲壮与苍凉，“烈士的正名”则一片苍凉。

几年来，我渐渐地习惯以史学票友的身份自居。票友的姿态，却不能带来轻松的心情，“革命之后怎样”反而压在心头愈发沉重。《民国温江县志》，我曾作为研究清末团练的史料浏览过，内里对保路前后史事的叙述之翔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再读一遍，这一读不得了，革命的“未亡人”、民国的“逸人”曾学传将革命和革命同志写入家乡历史的“阳谋”跃然纸上。我停不下笔，也完全无法再按照学术论文的体裁要求去写，任凭情绪推着走，情见乎辞。十几年前就读过雷铁崖的“十年革命党，三日秘书官”，他的四川同乡曾学传虽然不那么有名，笔端一点“世事一无可为”的无奈却是同样的。然而，这更给我以作票友的动力，原来历史书写在最无奈时也会成为不懈的诉求。历史，于我们总是有诸多用处。尽管落下那篇文章的最后一笔时，是酒后踉跄着回到燕园南端的小屋，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纸的孤寂，一室的孤寂。

就这样，一些问题在心头压了十几年，直到在香港“上岛入山”，在工作中“事上磨练”，才看到一部分真相及其背后的逻辑。其中，我关注与感慨的还是成为革命者的普通人的境

遇和心绪，他们有的功成名就，有的成为有名的烈士，有的成为无名的死难者，有的担负起了“未亡人”的责任。总之，他们都“生逢革命”。这不是一本有计划的书，只是一连串来自四川的故事，生生死死、悲悲喜喜而又似乎平平淡淡地，萦绕在我心头十几年，总算是有了些说法。用鲁迅的话说，我也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

这本书中的故事，就是这轻松之前“摇”出来的产物，我不是好的说书人，希望没有因为蹩脚的讲解，损伤故事的重量。

花开四朵，各表一枝。

目 录

第一章 “新则毁旧,旧则毁新”	
——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	1
第二章 “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	
——兼说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 ...	27
第三章 烈士的正名	
——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馭堉案考论 ...	55
第四章 将革命写入“里史”	
——曾学传纂修《民国温江县志》臆解	89
附 录	
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	
——清末直隶改良私塾的思想史分析	119
由禅让而共和	
——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	139
后 记	163

第一章 “新则毁旧， 旧则毁新”

——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

宣统元年(1909),四川举行户口调查新政。期间,威远县发生民变。对于这陡生的波澜,当时的官方定论文书仅集中于“匪”刘香亭而不及其他;1949年解放后的文史资料同样以刘香亭为支点,只是转了一百八十度,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采访、整理了“天保大元帅刘香亭领导农民和矿工反清起义”的有关史实。^①刘香亭,请他作为我们故事的第一位主角似乎

① 对于刘香亭领导的民变,三篇文史资料提供了口碑史料和初步研究成果,分别是周善道:《记一九〇九年威远天保大元帅起义》,《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编印,第88页;龙彻渊:《天保大元帅刘香亭领导农民和矿工武装起义述略》,《威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威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8页;刘述恒:《天保大元帅刘香亭领导农民和矿工反清起义始末考》,《威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威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293页。以下引用简称周善道文、龙彻渊文、刘述恒文,只标注页码。据刘述恒文介绍,周善道文写于龙彻渊文之先,他的资料主要来自连界场的出身商界后来参加“一贯道”的钱吉安。钱吉安在刘香亭起义时已是三十几岁乃至四十几岁,是知情较详者之一。而龙彻渊文写作较迟,采访资料时,健在的知情人已寥寥无几,向他提供情况的主要是刘香亭起义时年仅18岁的闵福和,加以当时的年轻人眼界不开阔,对社会上的事变很不注意,更由于他住在刘香亭活动区域的山崖之下,对山崖上发生的事知之不详。据笔者拙见,龙彻渊文的叙事也较为粗疏。刘述恒文则以“考”为名,宗旨为以周善道文为主线,以龙彻渊文及《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平定威远等县乱事情形片》(该片因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而为刘述恒、Roxann Prazniak等所注意,即本文中的《遵拟威富匪案片》)、《资中县志》和《刘氏族谱》中《刘熙字寿文》及口述材料为基本材料,对已有叙事做了对照鉴别、订正错误、补充遗漏并提出疑问的工作。Roxann Prazniak在所著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

很合适。不过，我更有兴趣观察他的“前后左右”，在重建此次民变本末的同时，描绘乡村团保、家族、哥老会以及衙门如何或显或隐地相互关联，成为一个容纳矛盾而又相依相维的复杂有机体，新政又怎样触动机关，引发整体的反动。从这个案例出发，我们或可进一步理解行政安排的社会意义，丰富对于清末新政之社会影响的认知，思考“革命者”刘香亭从何而来。

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一书中辟有讨论刘香亭案的一章(第131页)，主要依据以上三篇文史资料和赵尔巽奏片，揭出同盟会与社会中下层领导的反新政变乱脱离，反新政与增税、改革派的西化等因素之关系等方面，对刘香亭案的介绍大体限于文史资料的内容，亦与本文以团保组织为主线观照行政模式变革触及团保、家族、哥老会组织之整体社会的旨趣不同。清末威远县衙档案今已不存，也使得对本事件及清末威远政治的还原仅得鳞爪而不能窥全貌。

一 新旧之争与六月二十八日新场之变

清制，门牌悬于户首，为王朝编户齐民之标识。新政编查户口的政策落实到民户即是新钉门牌。是否接受这新钉的门牌也就成为是否接受户口新政的标志。威远的团保变乱案，曾限于毁弃门牌、打毁局所、禀官处理的范围。事情起于新七区，^① 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新场街面上的团首、豪棍等，而非“山后一带愚民”刘香亭。具体过程是：宣统元年六月初八日（1909年7月24日），铺户张式之将已钉门牌毁弃，并散布谣言“此牌一钉，使人迷性”。调查员长当面质询时，张式之“认毁不违，尤云某大户均称可毁”。知县德寿闻知后批示：“编查户口系部文饬办之件，张式之辄敢毁弃门牌，布散谣言，实属不法，候签唤查讯严究，以儆效尤。所有未钉各户赶紧一律钉毕造报。如果乡愚无知，误听谣言，务须剖切开导，毋任

① 威远新乡包括山王、兴隆、连界、新场四场，亦即此设新仁、新智、新礼、新义四保。新政中划区调查人口，兴隆、连界属新六区，新场属新七区。材料中也有新仁、新智、新礼、新义四区的说法，无从查考。

疑阻，致误要公。”^① 但并未传讯张式之。六月二十三日(8月8日)，新场“豪棍”杨晓峰又毁弃门牌，反称被人盗去。至此，尚无公然挑衅钉门牌、查户口之新政的行动。六月二十八日(8月13日)集期，聚众突变。团首刘松泉、唐为桃等鸣锣击鼓齐团，二千余人手执团旗枪炮，在红土地唐孝本家集商后，拥至新七区调查处、劝学局等新政机构所在的新场万寿宫^②，打破门窗，入内毁坏门牌等调查户口用品、调查员生活用品、劝学局的学务用品等，并将场上已钉门牌砍烂。德寿到新场弹压时，“伊等恃众要挟，县主畏伊人众，只得温言数语，而以为得势，逗钱、挂红、放炮，送县主于十里外。殊县主忠厚长者，既畏其众，又沾其名，是以迭稟请究，均置诸不闻不问，伊等愈加放恣，时而鸣金，聚散无常”。^③ 铺户试探，豪棍继之，团首齐团挟官，此联合行动反映了场镇上精英群体的自发抵制行为模式，挂红放炮、送县令于十里之外的仪式性胜利既先声夺人，也标明了集体行动的限度。

二十八日事发之后，调查员长等呈请知县作主，惩办作乱之团首。而蒋海山、刘松泉等以“合场团首”的名义在回应的

① 新七区调查长黄明新等稟，宣统元年六月，赵尔巽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343/66/1。

② 保路运动中，新场杨绍南即在万寿宫树旗起事，可见万寿宫是当时新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参见：黄宗扬：《辛亥革命史上一支英勇顽强的工人革命武装力量》，《威远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威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4页。

③ 新义区劝学员周帆登等稟，宣统元年六月；黄明新等状词，宣统元年八月，赵尔巽档案，343/66/1。

稟呈中辩称：“首等充当该场各处团首，体恩办理。兹设调查员长，特为丁数而举，效前门牌无异，不过察详而已。”“变更重举，民众不服。”民众固然可能因为藉牌敛财、“牌列十字”（以为强迫信仰洋教）等有疑而不服。但是，户口本为团保权力范围，现行转移，因此不服的主要是团保首人，这从“特为丁数而举，效前门牌无异，不过察详而已”的语气中即可感知。调查期间，调查员长“帖请”各保团甲向民众传达调查户口有关部章、张贴政府白话告示，俨然凌驾于团保首人之上；甚至“擅条示格团首姜美堂”，以团底作调查经费，更在人事和财务层面加剧了冲突。知县给调查员长们的回复是：“该乡编钉门牌、查造户口事件已札飭保总、保长办理，仰即遵照前次面谕。”^①这也正是“温言数语”的内容，在这一回合中，保总团首们夺回了失落的户政权力。原任之新七区调查长黄明新，调查员、“学生”（对川督之自称，不知其确切功名）萧治泉、吴兆鸾、唐光表、夏云奇又一纸状词，将刘松泉、唐为桃、杨晓峰、张式之一众人等告上省府。

四川省责嘉定府彻查，“学生”陈伦受知府之命调查事情经过，了解到户口新政启动后团保首人失权恐慌这一更大背景：

① 黄明新等为具声明协恳作主稟及知县批示；团首蒋海山、刘松泉等稟，宣统元年六月，赵尔巽档案，343/66/1。

威邑向来保总居政界最高之地位，此次实行调查章程，有“户口册造成，保甲坐废”之语，保总寓于目而棘于心。故隐存坐视之念，恐其速于成立而当局已转置诸闲散之乡也。邑中新乡肇祸，此为起点。^①

当地的口碑材料也显示：“新乡每一个场，都由威远县官委派当地的一名秀才总理其事，称为‘调查长’，下设两名调查员。这些调查人员，依仗官势，又系办‘新政’，比较总保、团首倒是洋气得多，因此，总保、团首们感到相形见绌，对调查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冷言冷语，激动人民，以增加对调查的阻力。”^② 团保权力失而复得，他们正是整个集体行动中的关键动员元素。黄明新等称查悉乡人初知恩临点团，一人不到，罚金一千，团旗军械概由团保首人经手，“非特别事故，不能拿出，若非弊串助虐，乡民从何而来？”^③ 陈伦亦言，新六区保总杨范卿趁势朦称款项支绌、请调查归并保甲办理，“即此而观，保甲之心显然可知。不然，乡民鸣锣集众，其先岂毫无闻？知者不力阻之，而又请归自办，非坐视而何？”^④ 对于鸣锣齐团，蒋海山等并不否认，但强调其齐团系为保卫治

① 陈伦禀文，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赵尔巽档案，309/60/7。

② 周善道文，第92页。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六月二十八日之变，新义区保总萧荣德、永清保保长萧治民等即曾出面拦阻，被执刀砍伤面部。

③ 黄明新等为声恳辞退禀，宣统元年六月，赵尔巽档案，343/66/1。

④ 陈伦禀文，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赵尔巽档案，309/60/7。